

《三国演义》与民本思想^{*}

段庸生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400067)

[摘要]《三国演义》的思想涉及民本思想,但《三国演义》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怎样的发展,则研究较少或不深入。从民本思想的源流探讨中,分析《三国演义》中民本思想的实质,从思想史的角度,可以看到《三国演义》对民本思想的发展。

[关键词]三国演义;民本思想;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5-0090-04

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从其与仁政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体现:行仁政者,当以民为本,而以民为本则凸现仁政思想。在封建专制君主集权制确立前,民本思想实则是由重神事到重人事的转换,而确立后,民本思想就成为“君权神授”的对立面或补充物而产生积极的历史意义。

在人类生产力较为低下时,“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神”是至上的,“民”的地位很低,甚至是被损害的,“残民奉天”、“残民尊神”,《尚书·盘庚》中有大量的此类记载。人们在甲骨卜辞的研究中也发现:“仆”、“妾”等字为黥首象形,“奴”、“役”等字为殴背象形,“奚”提其发,“羌”系其首,这实则是残民文化或者说奴隶文化的表现。而在殷商至周朝这一社会更替之中,“民”的力量得以显示,统治阶级也得到警示,泱泱大国殷商灭亡正是失掉民心的结果,于是武王指出“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庸庸、衎衎、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天视我民视,天听我民听”(《尚书·泰誓》),可以感知到对“民”的力量畏惧而尊民,并把“天意”转向“民意”,由尊神而开始了重人。初步具有敬德“保民而王”的思想命题。其中“用康保民”、“知小民之依”(《尚书·无逸》)把“民”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要条件。

应该说,民本思想的全面发展与成熟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割据混战,是否能霸天下,“民”就成为最关键的因素,也是各军阀争夺与争取的对象。甚至在“神”、“民”之间,“民”甚至被置于

“神”之上。《左传》、《国语》中的此类言论很多。比如“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民和然后神降之福”(《国语·鲁语上》)。之所以会如此,是这些军阀在征战过程之中,亲身感受到了如《春秋》中记载的“民变”、“民溃”的巨大力量,那种“以百姓为刍狗”的“不仁”行为,只能导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死”(《老子》第65,第49)的结果。所以墨子也多次强调“贱人”的利益,要求统治者讲“役夫之道”,“与百姓均事业”、“共劳苦”等。(见《墨子·尚贤》)

把“民本”思想系统化而发展到高峰应该推孟子。孟子阐发“民本”思想的言论很多,最为核心的是《尽心下》: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

在民、社稷、君的秩序排列中,孟子强调了“民贵君轻”。再结合孟子关于天时、地利、人和的论述看(详见《孟子·公孙丑下》),指出要得乎“民心”才能“天下顺之”,即“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如此得政于民的思想,有研究者甚至指出此乃是孟子把传统的尧舜时代天子民选制度加以理想化的产物。在此前提下,《孟子》中就提出了一系列“爱民”、“利民”而不“虐民”、“残民”、“罔民”的措施,诸如“制民以产”、“使民养生”、“听政于国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等等。至此,中国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准了。

我们对于“民本”思想溯源讨论的意义在于:

* [收稿日期]2007-05-17

[作者简介]段庸生(1965-),男,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其一,“民本”思想体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重人事。对于统治者而言,强调保民而王,其中不乏人文思想,人文精神。并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发展而得以丰富,比如荀子沿此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一舟水论,成为历代统治者的警策思想,以至于唐太宗以此作为对太子的日常教导语。

其二,“民本”思想中有使民生养的物质条件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历代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开国之主)采取措施,节制自我欲望,轻刑薄赋与民生息,历史上的物质丰盛时期“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在一定程度上显出民本思想的积极意义。同时,以民为本,也使统治者在自己的政治建设中注重民心向背,注重恤民爱民,以获取民心。如贾谊指出:“从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新书》),朱熹也指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宋史·朱熹传》),黄宗羲甚至指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如此,封建的统治阶层,在其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中,“民心”也不得不成为内容之一。

其三,民贵君轻,君为民设。历代沿传,深入人心,激荡中国文人忧国忧民思想,甚至奔走呼号,为民请命,强化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忧患主题。并且,“民本”思想,也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针砭时弊,反对暴君苛政的重要思想武器,要求统治者“施仁政于民”,使民本思想成为仁政思想的最直接表现。从孔子、孟子、贾谊、魏征,特别是到黄宗羲,乃至近代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则直接以此作为武器抗衡封建的君主专制,而产生积极的历史作用。

产生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在谴责暴政,残民损民政治时,又呼唤传统文化中的仁政、仁君,以救民于水火。而这种呼唤的表征便上“尊刘抑曹”。在仁政、民本思想的发展链条中,《三国演义》又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即上承先秦以来的行仁政,恤士民,民惟邦本,反对残民暴政思想,下启清初黄宗羲、王夫之乃至近代梁启超、康有为等人谴责视天下为一人之产业的独裁暴君,批判君主专制,倡导民主、改良的思想。

与民本思想的早期形态相比较,《三国演义》在民本思想上主要有如下贡献:

其一,由行仁政于民,保民而王天下,发展至君之立在于救民以得天下,治乱养民。过去强调君为民设,要求“修己安人”,《三国演义》同样强调君为民设,但更强调君要克己为群,“修己”变为了“克己”。

《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军阀混战,在民不堪命的

背景下,人们渴望解民倒悬之君。君之设不仅仅是“修己”而“安天下”,而是要于乱世之中给民以生息,老百姓期待着这样的君主出现。于是在《三国演义》中描写了老百姓是如何拥戴“仁王”刘备的情状:荆州百姓言:“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若要吃新饭,须待先主来”。(第 65 回)在天下混乱之际,象刘备能使民安宁丰足之君,这是老百姓盼望的。在刘备三让徐州时,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 12 回)“玄德入成都,百姓香花灯烛,迎门而接。”(第 65 回)如此“爱戴”拥立,既说明“仁王”刘备对于战乱中的老百姓无疑是救命稻草,反映出历经战乱渴望休息的时代心声,同时亦说明,刘备所施行的“王道”,与传统“王道”相比较,是真正意义上的与老百姓共命运,同休戚,是利益的共同一致,是鱼水关系。

以上既可见到对“君为民设”的继承,但作品更强调百姓之所以拥立刘备。

在《三国演义》之中,作品不仅强调刘备是“汉朝苗裔”,“帝室之胄”,而且更强调刘备始终以讨贼兴汉为己任,上安社稷,下安黎庶,突出在刘备身上对天下苍生的系念。在“二顾”诸葛亮时刘备留书道,请诸葛亮出山,是“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在“三顾”见面时便说“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在诸葛亮拒绝时,又泣曰:“先生不出,如苍生何?”其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到对传统文化中仁君立国之本是在于万民之忧乐的一脉相承。于是作品中特别渲染刘备是如何恤民爱民,时时以百姓利益为重。如在襄阳之败时,哀求刘琮开城门,“但欲救百姓”,入城时,又嘱托张飞“休惊百姓”,当张飞入城,引起城中兵战时,玄德又言“本欲求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第 41 回)。在当阳之败时,面对百姓于战乱中的惨景,玄德大哭:“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须强调的是,作品写刘备这类恤民爱民,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的,如襄阳为救百姓,致使襄阳重镇拱手让与曹操而自己无立身之地,如当阳为救百姓,日行十余里,致使有当阳惨败,这却更突出了刘备“临难仁心存百姓”,正与卓、操一类“无君无父之人”的残暴行为,利己自私行为形成对照。

由此观之,《三国演义》所追求的仁政理想不是以“王”为目标,而是以安天下,为苍生为目标。传统的仁政思想强调“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修身”(《孟子·离娄上》),国家与个人,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伦理与政治合为一体。君行仁政

于天下,其终极目的是统治天下,由奉行伦常而达于天下秩序。“由此为政,自然合于王道,由此立身行己,自然合于天理,无所入而不是”。而于《三国演义》中是天下为公,不是天下为己,即“君”是以社会性的本质特征而存在,“君”的个体修为与规范不仅仅是重于道德情操而行仁政于天下,而且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实践,强调鼎定天下的积极进取精神,为民保民,感化人心,获取民众。由于“王”天下不是最高目标(刘备多次推阻称王即是例证),安天下才是最高目标,故真正的“君”在《三国演义》中能自我抑制,甚至于自我牺牲。刘备之为天下苍生,就是一种自我牺牲,“民”由卑下的生而推至崇高的生,故蜀中基业之失败在作品中充满了悲壮的英雄氛围。而这一点,是过去仁政思想中较少表述的。

其二,《三国演义》中由保民为民重民进而重人事,“人”成为事物发展的主宰,所以在作品中崇尚并高扬人的主体自觉和独立的人格意识,使作品充满了较强的人文精神思想,正如刘备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慨叹“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第41回)。

我们于《三国演义》之中处处可以感知到无数战争的强弱易势,胜利与失败皆是“人谋”的结果,成败得失与天下的最终归属皆是“人为”的结果,即使是自然的天象、气数,也是人造成的某种结果的预兆。“人”成了事物发展方向最关键的要素,于是作品描写了各军阀是如何去争取“人”。这在作品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争取人心,一是争取人才。在争取人心方面,刘备之民心所向是自不待言,作为奸雄的曹操亦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在攻取荆、襄时,对于沿道百姓“俱用好言抚谕”(第41回),在行军之中,坐骑踏坏百姓庄稼,亦割发谢罪,以示与民秋毫无犯。即使如李傕、郭汜一类,在贾诩屡劝之下,亦“抚安百姓,结贤豪,自是朝廷微有生意”(第10回)。反之如桓、灵二帝“禁固善类,崇信宦官”而人心尽失,则是作品所谴责的。

而在争取人才方面,或以道、或以术,尽可能地招贤纳士,罗致人才,所达目的乃“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短歌行》)。

就上述两点而论,仍然继承了传统的仁政、民本思想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如儒家把天、地、人作为“三才”,而在“三才”之中,人最为重要,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与之的承传关系。但《三国演义》中,又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意识,所写之“人”,无一不具有张扬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他们于作品中之外表、语言、行动以至于精神无不张弛自如,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而不是某种伦常关

系下的附庸。高雅智谋者如诸葛亮、周瑜;刚猛者如夏侯惇、张飞、许褚;忠勇者如关羽、张辽、黄盖;儒雅俊逸者如陆逊、周瑜;巧智者如张松、秦宓;文采者如曹植、陈琳;狷狂者如祢衡、左慈;隐逸者如司马徽、石广元、孟公威;勇者披坚执锐,以决生死;智者殚虑竭思,以衡巧拙;隐者遗世独立,以示超逸。等等。他们无一不展示出极强的人格魅力。

如此张弛的个性和强烈的主体意识,对于明朝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与发展而形成人文主义思想性质的思想体系起到了很好的奠基作用。比如泰州学派所提倡的人的平等、个性解放、强调人的价值观念等;以李贽为代表的“异端”,其中包括徐渭、袁宏道、汤显祖、孟称舜等,更是强调人格的独立和天赋人性,由此开启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启蒙思潮。

还应强调的是,《三国演义》在民本思想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主体意识和人性张扬,又非如竹林七贤一类带着对整个社会的摈弃。相反,他们正是在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中所表现出的主体意识和人格独立。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孟子·尽心下》),以此去追求生命的价值意义。《三国演义》中众多人物的奔走干谒,甚至朝秦暮楚,特别像诸葛亮由高卧隆中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隐士而成为两朝开济的时代俊杰,这些正是他们渴望于乱世建功立业的积极人生态度,表现出对现实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以天下为己任,抗奋自信,使作品洋溢着极强的生命意识和积极干世的主流文化。

其三,传统的仁政思想中,虽然强调“君”为民设,但也强调在君臣、君民关系中的秩序、伦常,即依赖于伦常的强制性去维护臣属关系和统治天下的秩序。而在《三国演义》中则发展为尚仁讲信、以仁、信为纽带去建立臣属关系,并以此去保持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即相守以礼、相许以信的理想政治。

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中认同:伦理化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一个政治特征,即在处理现实人际关系上,要依赖于伦常,核心观念是“三纲五常”,具体标准是“忠孝仁爱”,人人“尽伦”,社会就稳,“尽伦”中“君”的德化仁政是方面之一。而人们在研究传统仁政思想的目的时又发现:“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三者引导和消融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

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李泽厚《美的历程》第 55 页)意即说明:伦理道德规范着人的行为。

反观《三国演义》所追寻的君民关系和所理想的君臣关系则不是由伦理道德去规范的。

首先,寻求人格的一致及最高理想共同的臣属关系。就整个《三国演义》而论,谋臣武士的奔走干谒,寻求机遇,而其终极归属大多与人格道德相关联。诸葛亮之所归属刘备,一方面是其深居隆中相机而动,另一方面是刘备三顾之“礼”所体现对其人格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刘备以天下苍生为念,以汉室社稷为重的政治思想与自己的政治抱负正相一致,如此的“士遇知己”是道德理想一致基础上的君臣际遇,如此建立的臣属关系由于有了道德理想追求的一致性而可以经历任何风雨。其他如单福、庞士元、张松归刘备;陈宫投曹又弃曹、许攸弃袁投曹等等,其情形也与此颇为相关。

其次是寻求情感投合的臣属关系。君与臣、君与民既利益攸关,而又情感投合。作品以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描写了蜀中托名君臣,实则情同手中的臣属关系。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甚至置江山社稷、妻子家小于不顾,而重手足之情,诚为腹心之交。

如此臣属关系,君与民是鱼水之欢,君与臣是风云际会。君臣、君民之间是相得甚欢,完全超乎了靠伦常、宗法所强制维持的臣属关系。以道德的理想和情感的相互投合而关联人际关系,上对下则

以礼以诚,下对上则以忠以信,《三国演义》中刘备待诸葛亮、待关、张、赵云等;孙权待周瑜、鲁肃、黄盖等;乃至曹操待张辽、庞德,等等皆是以礼、以诚去打动他们。正是如此,这些人才会为自己的人主鞠躬尽瘁,肝脑涂地,死而后已,并在最关键时候,舍生相随,拼死报主,正是诚信、忠义的精神体现。很明显,《三国演义》中强调突出的礼、诚、信等不是本质上的伦理规范与制度,而是情感纽带。而传统的仁政思想中,这些东西都是自觉的和强制的规范要求。比如如何守“礼”,《礼记》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曲礼上》)、“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理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器》)、“礼”是规范人人之间的强制手段。李泽厚把其中功利概括为二,“一方面它强调道德的先验的普遍性、绝对性,所以要求无条件地履行伦理义务,在这里颇有类于康德的‘绝对命令’;而另一方面,它又把这种‘绝对命令’的先验普遍性与经验世界的人的情感直接联系起来,并以它(心理情感)为基础。”(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第 49 页)如此一比较,《三国演义》在这一点上的突破与发展就非常明显了。

须指出的是,《三国演义》对民本思想的发展是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也缺少对宗法制、君权制等实质性的认识,其思想深度还未能及黄宗羲等人,但其发展应于肯定。

(责任编辑:朱德东)

Three Kingdoms and people—based thoughts

DUAN Yong—s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News,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The thoughts of Three Kingdoms include people—based thoughts, however, there are few and plain researches on how Three Kingdoms develops people—based though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people—based thoughts in Three Kingdoms from the evolution of people—based thoughts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Three Kingdom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based thoughts from the angle of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Keywords: Three Kingdoms; people—based thoughts; development